

A sepia-toned photograph of a large,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complex, likely a temple or palace, situated on a hillside. The main building has a long, low profile with a tiled roof and is surrounded by smaller structures and lush vegetation. A body of water is visible in the foreground, reflecting the scene.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大哲学系1952年

何醒 编

商务印书馆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哲学系1952年/何醒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9342-2

I. ①北… II. ①何… III. ①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建设—
教育史—1952 IV. ①G649.281 ②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976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大哲学系1952年

何醒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9342-2

2012年10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 45.00元

楔子 ... 001

先生印象：一方新地隔河烟，曾接诸生听管弦

汤用彤先生	贯通中西、华梵的大学者 ... 011
冯友兰先生	阐旧邦以辅新命 ... 019
张岱年先生	刚毅木讷近仁 ... 029
朱谦之先生	精诚写为百卷书 ... 039
朱伯崑先生	学圃无过老圃知 ... 050
任继愈先生	“凤毛麟角”的学者 ... 056
张 颐先生	西洋古典哲学研究的先驱 ... 064
贺 麟先生	弘传西学与当代哲学建设 ... 072
郑 昕先生	邃密求真与哲人风骨 ... 079
洪 谦先生	享誉世界的中国哲学家 ... 084
熊 伟先生	海德格尔的中国传薪者 ... 095
汪子嵩先生	研究希腊哲学是我最喜欢的事 ... 102
张世英先生	明中西之变，究天人之际 ... 109
金岳霖先生	道超青牛，论高白马 ... 117
沈有鼎先生	沉醉于形而上的世界 ... 131
王宪钧先生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 143
胡世华先生	数理逻辑与计算机 ... 148
汪奠基先生	中国逻辑史之探赜发微 ... 157
周礼全先生	探索自然语言的逻辑奥秘 ... 166

邓以蛰先生	书韵画境寄玄思 ... 174
宗白华先生	天光云影共徘徊 ... 182
马 采先生	精研顾痴注画鉴 ... 194
周辅成先生	伦理学之执著燃灯者 ... 202

学生回忆：感君拂拭遗音在，更奏新声明月天

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初创岁月

——黄枬森先生访谈录 ... 211

西哲教研室，我的真正的大学

——朱德生先生访谈录 ... 220

负笈燕园，在这里走上美学之路

——刘纲纪先生访谈录 ... 228

回忆前辈的师范与学风

——谢龙先生访谈录 ... 238

薪火相传，燕园学习生活杂忆

——王福霖先生访谈录 ... 242

北大从红楼迁燕园

——宋文坚先生的回忆之一 ... 249

我对 1952 年的反思

——宋文坚先生的回忆之二 ... 256

主要参考文献 ... 268

后记 ... 271

楔子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写过这样的诗句：“假如我们在记忆的暮光里重逢，我们会接续曾经的交谈，听你们吟唱那些深远的歌……”这一次为我们记忆的暮光笼罩的，是1952年的燕园，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哲学系，汇聚了现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最优秀的哲学家们，我们能通过当下的追忆与他们重逢吗？

今年是北大哲学系的百年系庆。就国内大学的哲学系而言，北大哲学系无疑是历史最悠久的，也是历史最完整的。说她历史最悠久，乃谓从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哲学门，迄今正满一百岁；说她历史最完整，正是基于我们要述及的这段院系调整的变迁。因为1952年的院系调整，其他大学的哲学系的系史上都留下了令人遗憾的一段空白，唯独北大哲学系，安然地甚或奇异而辉煌地度过了这一年。

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是现代大学教育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一变革的主要动机是将旧中国的旧大学改造成新中国的新大学，而采用的改造方式一是全盘仿照苏联的大学体制，进行院校的撤销、合并或建立，各院系也随之作大调整；二是与之同时推行的，是在大学内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

北京的院系调整比全国其他地方开始得早，1949年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启动。当年6月，北京大学取消了教育系。8月，中法大学医学院并入北大，

辅仁大学农艺系并入北大。9月，北大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11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决定将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业务改由卫生部领导，1950年2月正式移交。医学院自此脱离北大，改名北京医学院。

1951年5月18日，政务院批准了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报告，确定要适当而有步骤地充实和调整原有的高等院校的院系。1951年10月30日，政务院批准了全国高校调整方案。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旧大学都要进行改造，就像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中指出的：“旧中国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如果不对旧的教育制度、旧的高等教育设置加以彻底的调整和根本的改革，就不能使我们国家的各种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旧中国的旧大学大多是按照德国模式或美国模式建立的，而新中国的新大学要学习苏联模式，将高等院校分为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尤其是有些人文社会科学的系科，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没有必要各高校都设立，比如哲学系，旧大学中有很多哲学系，而在这次院系调整中，除了北大保留唯一的一个哲学系外，其他的大学一律取消。这样一来，清华、燕京、辅仁、南大等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也就被调整到了北大哲学系。

从现代中国哲学教育的全局来看，这无疑是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改变，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在此之前，南北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已经有了各自的历史和学术体制，也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性格，汇集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名家，哲学教育呈现着百家争鸣的态势。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哲学系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其历史无须赘言，可参见北大哲学系所编《北京大学哲学系系史》。清华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26年，由金岳霖、冯友兰等创建，名流荟萃，实力雄厚，且富有创造性，被视为20世纪前期“清华学派”的主干之一。燕京大学哲学系，于1919年春始建，为燕大第一批二十四个学科之一，

中西哲学课程体系十分完善，有许多著名教授曾来此执掌教席。辅仁大学哲学系，创立于1928年，设置在文学院之中，是大学本科四系之一。中法大学哲学系，创立于1920年，属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二系之一，1937年停办。武汉大学哲学系，其前身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哲学系，创建于1922年，很多著名教授在此执教，学术渊深，在国内有很大影响。南京大学哲学系，前身是中央大学哲学系，创立于1920年，为南方哲学重镇，其教学与研究体制十分完备，除文学院之哲学系之外，还有中央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下辖之哲学部，主办有学术期刊《文史哲季刊》，先后执教于此的名家更是难以枚举。中山大学哲学系，创立于1924年，为中山大学创建之最早的学系之一，闻名岭南。另外，南开大学哲学系，自1919年建校之日起，即设有哲学学门，1923年改为哲学系。抗战期间，南开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大，其哲学系与北大、清华亦有千丝万缕之联系，各类课程完善，执教名家众多。因为当时的中国大学，教授流动频繁，很多人都先后执教过各大学的哲学系，这些哲学系之间有经常性的联系与交流，故此既能自成一格，又能共襄中国哲学的大举。

1952年秋天，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众多教师齐聚燕园，他们中有北京大学的汤用彤（中国哲学史、佛教史）、胡世华（逻辑学）、贺麟（西方哲学史）、郑昕（西方哲学史）、容肇祖（中国哲学史）、汪子嵩（西方哲学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邓艾民（中国哲学史）、齐良骥（西方哲学史）、王太庆（西方哲学史）、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晏成书（逻辑学）、杨祖陶（西方哲学史）、王维诚（中国哲学史）；清华大学的金岳霖（逻辑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沈有鼎（逻辑学）、张岱年（中国哲学史）、任华（西方哲学史）、王宪钧（逻辑学）、邓以蛰（美学）、周礼全（逻辑学）、朱伯崑（中国哲学史）；燕京大学的洪谦（西方哲学史）、张东荪（社会学）、吴允曾（逻辑学）、王毅（中国哲学史）；辅仁大学的汪奠基（中国逻辑史）、李世繁（逻辑学）、王锦第（西方哲学史）；中法大学的许宝骙（西方哲学史）；武汉大学的黄子通（中

国哲学史)、周辅成(伦理学)、江天骥(西方哲学史、逻辑学)、张世英(西方哲学史)、陈修斋(西方哲学史)、石峻(中国哲学史);南京大学的宗白华(美学)、张颐(西方哲学史)(其时在四川老家,但工作关系在北大)、何兆清(逻辑学)、苗力田(西方哲学史);中山大学的朱谦之(东方哲学)、马采(美学)、李曰华(中国哲学史)、容汝幌(逻辑学)、方书春(西方哲学史)。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哲学系,可谓群贤毕至,灿若星河。在本书第一部分“先生印象”,我们为其中的二十余位学者,撰写了简明扼要的传记文章,通过这些文章,读者可以初步了解这些学者的生平事迹、人格气象以及学术成就。那次调整对于北大哲学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且深远的。尽管此前,北大哲学系也称得上是各大学哲学系之翘楚;但是通过那次调整,北大哲学系就像得到一笔横财,师资阵容一时形成前所未有、后难再现的盛况。在北大哲学系自身的历史上,院系调整后哲学系这一人才济济的盛况,迄今也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如果仅就调整后北大哲学系的师资盛况来看各个专业的变化,各专业都蔚为大观,学术性格亦有所改变,且为北大哲学系各专业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先以中国哲学专业为例,原来的北大哲学系非常重视中国哲学的历史。从早期的哲学门到后来的哲学系,先后在此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有马叙伦、陈汉章、陈黻宸、胡适、徐炳昶、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诸先生,在经学、诸子、宋学、佛教史各方面均有所长。胡适先生长期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早典范。在院系调整之前,以汤用彤先生为代表的北大哲学系重“史”,和以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清华哲学系重“论”,形成了双峰对峙的局面。而院系调整之后,随着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的调入,北大哲学系的中国哲学研究则逐渐发生变化,融合成“史”“论”兼重的新的学术风格。

西方哲学方面,先后有张颐、贺麟、郑昕、陈康等先生。北大哲学系的德

国古典哲学和希腊哲学最为擅长；而院系调整之后，随着洪谦、熊伟等先生的调入，现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两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主干，由此古典与现代兼重。

逻辑学方面变化更大。调整之前，北大哲学系虽然也有逻辑方面的专家，如早期的章士钊、后期的胡世华先生，但现代逻辑学的中心无疑是在有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等先生的清华哲学系。随着他们转入北大哲学系，这个学术中心也一同转移过来，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另一主干专业。

在美学方面，1921年，在蔡元培先生的提倡下，北大开设了美学、美学名著研究、西方美术史等课程，蔡元培曾亲自讲授美学课。此后有张竞生、邓以蛰等先生一度在北大哲学系讲授美学方面的课程。院系调整之后，有“北邓南宗”之称的邓以蛰、宗白华二先生，齐聚北大哲学系，加上中山大学来的马采先生，或再加上虽隶属西语系但常在哲学系任课的朱光潜先生，美学专业一时称雄全国，并于1960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美学教研室。

此外，北大哲学系从创建之初就有宗教学研究的传统，尤以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见长，先后任教于此的有梁漱溟、钢和泰、熊十力、周叔迦、汤用彤诸先生，担任其他宗教课程的还有江绍原、朱谦之等先生。院系调整之后，宗教学研究基本上陷入停顿，到了80年代，宗教学研究重新开展，北大哲学系的传统优势也逐渐恢复，先后建立宗教学专业和宗教学系，教学和科研均走在全国的前列。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北大哲学系既是哲学门成立以来一校传统的延续，又是1952年院系调整重新塑造的，是在一次难得的机缘中重生的。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这次调整在当时就导致了北大哲学系在学术上的大发展，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知道1952年院系调整同时是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汇聚到北大哲学系的绝大多数旧教授，虽然或学问上渊综博雅，或思想上自成一家，但是并不能继续传道授业，他们被剥夺了上讲坛的权利，更遑论继续著书立说了。

耐心地读完本书“先生印象”部分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少数能与时俱进的学者之外，大多数学者的学术历程都有一个峰谷之间的曲线变化，50年代之前已经达到一个高峰，随即在院系调整后陷入波谷，到了80年代之后才重新攀上另一个高峰。这中间的原因不言而喻。但在学术上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举例来说，宗白华先生在调入北大之前，美学上已经有很高的学术成就，特别是我们在他的遗稿中发现了几部写作于40年代后期的思考中国形上学问题的笔记，从这些笔记来看，宗白华先生一直试图建立一套自己的、非常有独创性的中国形上学，设想如果有适宜的环境，有足够的时间，这些笔记将以著作的形式贡献于中国哲学界，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们沉睡在旧箱子中长达50年。

汤一介在回忆父亲汤用彤先生的一篇访谈中说：“你刚才说到父亲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这之后他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你这个看法我很认同，实际上，如果你认真地来看，1949年之后不仅是父亲一个人，而是一批老学者都没有写出过比较好的著作：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地位是由新中国成立前的‘贞元六书’奠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著作包括《哲学史新编》都没有超越他以前的东西。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和《知识论》也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之后的东西甚至都走错了路，他在《逻辑学》中说‘逻辑有阶级性’到现在恐怕要成为学界的笑话，虽然这怪不得金先生。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伤害，让他们不再说真话了，在学术上也就不没有办法前进了。”

这种伤害不仅是思想上的，甚至包括肉体上的。在选择“先生印象”中的人物时，我们曾想写一写张东荪先生。张东荪先生是旧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他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私立哲学馆。在辛亥革命前后，以宣传新思潮的政论闻名，曾主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解放与改造》杂志，后来又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杂志。在学术方面，张东荪先生先后执教于上海公学、上海光

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主要教授西方哲学和社会学。张东荪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后，提倡全盘西化，宣传改良社会主义，参与过科学与玄学论战，还发起过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他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新唯心论领袖”。除了从事哲学研究之外，他一直活跃在政坛，这也使得他最终为政治的风浪所吞没。1952年，时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张东荪先生调入北大哲学系，但在1954年被免去教职，“文革”期间被关入秦城监狱，在狱中逝世。

当然，1952年毕竟是个新开始，这里的老师们走进了一个新时代，这里的学生们则逐渐成了这个新时代的主人。他们毕竟受过前辈们耳提面命的教诲，他们把这里的人和事，这里的学问和精神都牢记在脑海之中。此后不久，全国各大学又开始复建哲学系，而由北大哲学系培养出的一批批学生们，则将这里的治学精神和学术规范带到全国各大学，促成了许许多多哲学系的新生。

还有一个必须提到的方面，在北大哲学门创建之初，就设有心理学的课程，此后心理学成了北大哲学系的主要专业之一。北大哲学系最早讲授心理学课程的是曾任哲学系主任的陈大齐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时，各哲学系心理学专业的一些教师也调整到北大哲学系，其中有来自清华大学的孙国华、唐钺、周先庚、沈履、邵郊，来自燕京大学的沈迺璋、陈舒永、陈仲庚、孟昭兰，来自武汉大学的程迺颐等。因为哲学系的整体学术环境，心理学专业的教授们除了进行心理学研究外，很多人兼通哲学，也有哲学方面的著作，其中陈大齐先生为其著者。因为自1978年始，心理学专业从北大哲学系分出，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科，故在本书中，没有对其专门绍述，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心理学专业的前辈们曾经和我们一起走过六十六年的历史。

今天回味往事的心情，可淡然如品优茗，可空灵如转水光，亦可绚烂如览朝霞，甚或沉抑如闻暮鼓。不同年纪、不同身份的人对于时间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北大哲学系就如同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长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鲜活的

记忆，似乎用沉稳平和的语调一遍遍诉说与缅怀。而曾在此走过那段岁月、切实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则在这份诉说与缅怀中带着感叹，带着回味，带着追怀，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别样的世界。

（吴 湘）

先生印象

一方新地隔河烟，曾接诸生听管弦

汤用彤先生

贯通中西、华梵的大学者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校，出任国文教员，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8年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大学，主修哲学。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1930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汤用彤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精通内外经典，并接受过严格的外国哲学、语言和治学方法的训练；治学严谨，他的学术著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在出版几十年后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经典著作。汤用彤先生一生抱定“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他认为，需要通过对民族文化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客观研究，从中总结规律，展示经验和教训，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他特别强

调，在冲突、调和、融合的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不会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根本特性。汤用彤本着“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求”的治学精神，精考事实，探本求源，平情立言，其结论宏通平正，对今人的学术文化研究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汤先生的著作今人编有七卷本《汤用彤全集》，收集了可以找到的已刊和未刊汤用彤的论著和读书札记、教学讲义及提纲、演讲提纲、信札以及学生的听课笔记。

—

汤用彤出生于湖北黄梅的官宦之家，幼承庭训，十五岁入北京顺天学校，与梁漱溟、张申府等人同校。1912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始与吴宓结识。在清华期间，汤用彤在接受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学训练的同时，与志同道合者钻研国学，二十一岁时完成少作《理学谰言》，并刊布于《清华周刊》，阐发朱陆之学，以理学为救治中国之良药，为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他还与吴宓等人创办了“天人学会”，意图“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

1918年，汤用彤赴美，先入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学习，1920年转学到哈佛大学，主修西方哲学，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印度哲学。在哈佛期间，汤用彤与吴宓、陈寅恪、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受哈佛新人文主义学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很大，系统地接受了他的新人文主义理念，在治学态度、方法、领域等方面都效法于白璧德，兼治东西，并览古今，并且非常重视佛教研究。

1922年夏，汤用彤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旋即归国。由梅光迪、吴宓推荐，应南京东南大学之聘，出任哲学系教授。同时，到支那内学院就学于欧阳竟无先生，与熊十力、蒙文通等为同学，后又兼任支那内学院巴利文导